

(上接第一版)

## 走专业出版的先驱者

1938年,钱君匋创办万叶书店。从万叶书店走过的路来看,钱君匋是当之无愧的专业出版的先驱者。

在出版方向上,钱君匋一直在努力探索,文学类、儿童读物类、翻译类、音乐类以及教材教辅类,林林总总,一路走来,万叶书店的经营状况始终保持“衣食无忧”。但是,经过“四面出击”的探索后,在老友缪天瑞的建议下,钱君匋最终将出版音乐作品定为万叶书店的发展方向。

钱君匋在回忆万叶书店时说:“我在想,出版美术和文学、儿童读物,在编辑上、技术上都比较容易;出版音乐书籍,因为情况复杂,比较困难。我既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如果我不去搞这一行,那就不会再有比我更内行的人去搞了(指音乐和出版)。于是我就毅然决然地在万叶书店后期,把原来平均从事儿童读物、美术读物、文学读物的出版,一下子改了个调子,停止了以上这些门类的出版,转到音乐上来,专门致力于这方面的出版……专心致志地向音乐书籍大踏步进军,成为我国独一无二的一家音乐专业出版社。”这一转向,使万叶书店在抗战胜利后走出了一条创新的发展之路。

此时,钱君匋40岁出头,正是大显身手的年华。

专业化以后的万叶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在出版业的红海里创出了一片蔚蓝色海洋,在经济效益与社会声誉方面获得了双丰收。据有关资料介绍,此后几年间,万叶书店出版了200多种音乐理论专著、歌曲集、乐谱,如《中国音乐史纲》《音乐技术学习丛刊》《民间音乐研究》《曲式法》《万叶歌曲集》《新疆民间合唱选》等,有些书籍印数不少,一版再版乃至十多版。有人称钱君匋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音乐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被业界誉为“我国现代音乐出版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从一个小作坊开始,发展到实行股份制的现代企业;从低成本运作到多品种经营,再到专业出版,实现由少到多由多到好的发展和转变。钱君匋的出版业经营理念,适应出版特点,顺应出版规律,也显示了他的出版经营智慧。

## 情归故里无偿捐赠

晚年的钱君匋是快乐充实的。他常回故乡与乡亲聊天回忆往事,或走亲访友挥毫泼墨,在浓浓的乡情里笑声不断。

那时我在桐乡县委宣传部工作,常有机会联系名家大师。一次,县委邀请上海书画名家到桐乡参观访问,休闲作画。午饭后在县委会议室休息时,我见钱先生独自在沙发上坐着,就过去和他聊天。当时想起钱先生在茅

盾去世后写的纪念文章中曾专门提到茅盾在开明书店聚餐会上背《红楼梦》的事情,便请教他是不是真的?钱先生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当时我还为此事作证呢。”然后他把章锡琛与郑振铎为茅盾能否背《红楼梦》打赌,并让钱君匋当证人的事,又说了一遍。我发现,钱先生的记忆力非常好,几十年前的往事,说得清清楚楚。

听钱先生聊往事,感觉有一种“穿越”的享受,仿佛陪着他回到他年轻时风风火火的年代。当时我对茅盾的书法颇感兴趣,便请教钱先生,茅盾临摹过谁的字?他不假思索地说,茅盾临摹过陆润庠。他接着解释,过去那个年代的小孩子,临摹一定要学状元的字。可惜后来我忙于其他事务,未对茅盾的书法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钱先生早年远离家乡到上海谋生,但家乡人仍把他当作桐乡县德高望重的长者,有什么事写信给他或当面请教,他都无私地予以帮助。当时我对茅盾作品中的江浙方言注释编写了《茅盾作品中的江浙方言浅注》,便写信请他题写书名。没几天,就收到了钱先生的题签。后来,钱先生还为县委宣传部的工作文集题写了《一得集》《百花集》等书名,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钟声送尽流光。经过岁月洗练之后的钱君匋对人生的思考更加通达。如何保存好自己用一生心血搜集起来的文物?1985年初,



钱君匋先生与夫人陈学馨在君匋艺术院前留影。

钱君匋在夫人和三个儿子的支持下,作出了将一生收藏包括自己的作品悉数无偿捐献给国家,由故乡桐乡县永久保存的决定!

很快,桐乡县人民政府作出积极回应,在当时财政还不宽裕的情况下,拨款百万元,建立君匋艺术院,永久保存钱君匋一生心血的结晶。

1987年11月,君匋艺术院落成。那几天,县领导与县文化局上上下下的同志都在为迎接钱君匋捐赠的文物而忙碌。

11月5日,秋天的一个平常日子,却是钱君匋与其共患难的夫人陈学馨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笔者时任县文化局局长,据专程赴沪接受钱先生捐献文物、办理移交接运的同志介绍,那天钱先生夫妇一早就起床等候故乡同志去接运了。于他而言,是要将自己相伴一生的“儿女”亲手交给后

人去抚养了。钱先生亲自上楼,一件一件搬下楼,当他捧着新罗山人的册页递交给故乡来接运的同志时,老人的手颤抖着。

君匋艺术院的落成典礼定于11月10日举行。然而,钱先生等不及了。亲手捐赠心爱之物后仅隔一天,即11月7日,他就动身赶往桐乡,急于再看看自己一手积累起来的4000余件文物,运输是否安全?摆放是否妥贴?有没有损坏?那几天,钱先生肯定无法入眠。

11月10日,君匋艺术院开院。81岁的钱君匋神采奕奕,以主人身份,在众多领导、朋友的掌声里,热情洋溢地发表了题为《感想和祝愿》的讲话。

1998年7月4日,钱君匋因病住进上海瑞金医院,8月2日10时23分逝世,享年92岁!一代艺术大师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照片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 徐志摩两封书信小考

金传胜

2015年,陈建军先生在《关于徐志摩的一则日记》(见《现代文坛辑录》)中披露徐志摩致上海小报《罗宾汉》主撰的一封信。该信题为《徐志摩》,载1929年9月29日《罗宾汉》,2018年被辑入陈建军与徐志东合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远山:徐志摩佚作集》。全函如下:

《罗宾汉》主撰诸先生:今天的贵报载有《陕灾义赈会之票串》一则,内有愚夫妇合演《玉堂春》剧目,这或许是传闻之误。但如果“洛侨”先生的消息是得之于陕灾义赈会或该会之宣传人员,则我们不得不借重贵报的地位,郑重申明这是完全无稽之谈。前年我们曾经为了却不过朋友的央求,胡乱串演过几次戏,但已往的经验却并不是过于愉快,我自己于演戏本是完全外行,又无兴趣,内人虽则比较的有兴致,但她年来的身体简直是疲弱到一些小事都不能劳动,不说演剧一类事。所以我们对于演剧一事是决不敢再轻于尝试的。这次陕灾义赈会的消息,说来更觉可笑,事前一无接洽,也不知是那位好事先生随意把我们的名字给放了上去,连累不少的亲友都特来问及,这也算是小小的一种恶作剧了。现在更离奇了,竟然连剧目都给排了出来,真是叫人好气又好笑的,为了及早解除外界的误会以及招摇人等的“胡来”,我们特写这信给贵报,敬请立即刊入下期,不胜感念之至。敬颂撰安。

编者所加的题注中有“此信作于1929年9月下旬”的说明。经查,署名洛侨的《陕灾义赈会之票串》刊于1929年9月26日《罗宾汉》第二版。文中确有徐志摩将与陆小曼在陕西赈灾游艺会中等合演《玉堂春》的“预告”。因此可确定徐志摩的信

函写于9月26日。

《关于徐志摩的一则日记》在梳理了徐志摩三次客串《玉堂春》的史实后,认为徐信中所谓不再登台表演的两个原因——“我自己于演戏本是完全外行,又无兴趣”和陆小曼“虽则比较的有兴致”但身体疲弱,都只是表面说辞,而“已往的经验却并不是过于愉快”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此处不赘述。不过,陕灾义赈会方面与徐志摩夫妇是否“事前一无接洽”,或许也不尽然。

1929年1月,旅沪陕西籍人士鉴于“陕西自辛亥以还,兵匪扰攘,民不堪命,自春迄今,雨泽毫无,饿殍载道,惨不忍睹”,在上海组织成立陕西赈灾会,“力图募捐救济,涓滴济灾民”(《陕西赈灾会成立讯》,1929年1月5日《申报》)。同年10月2日、3日,旅沪陕西赈灾会假座中央大戏院举行游艺会。同在3日发行的《上海画报》第五一三期为“陕赈游艺特刊”,由黄梅生主编。梅生(即黄梅生)的《谈陕灾游艺会》提到:“惜陆小曼女士以病未先加入,令人不能一饱耳福为憾耳。”俞俞的《陕赈游艺特刊赘言》中则有“徐志摩陆小曼梁孟翁端午黄梅生二先生原拟合演全本玉堂春,小曼夫人忽染小恙,太夫人不欲其力疾登台,大好佳剧,遂尔作罢”和“丹翁旋苏未还,亦尚不知鼎鼎大名之小曼夫人志摩端午先生名剧之改演也”的内容。由此看来,《罗宾汉》上的消息虽然不实,却非空穴来风。即使陕灾义赈会主办方未曾邀请徐志摩客串,一些喜欢热闹的朋友很可能曾有约志摩、小曼再次登

台的提议,只是未获他们同意。

小报刊载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本属平常之事。徐志摩致函《罗宾汉》主笔澄清事实,一方面说明上海小报在当时市民中的影响不可小觑,另一方面也表明“《福尔摩斯》事件”后,徐志摩不想陆小曼再惹是非,而是能够“从此振拔”。

## 二

金黎明、虞坤林整理的《徐志摩书信新编:增补本》辑有徐志摩致李平的一通书信,题注“此信摘自原件”,归入“作年无考”类。全函照录如次:

孤帆我兄:中社成立,适弟在宁,不获雅与其盛,怅怅何似!社址不知何日落成,亟盼之矣。适之已北去,但不久即归。兄何时有暇,拟趋候一谈。

志摩敬候  
星四

李孤帆,名平,以字行世。浙江宁波人,生卒年不详。据有关文献,1922年李孤帆曾与朋友发起成立香港华商证券物品交易所有限公司,1923年在汉口从事地产办理事务,参与创办《银行杂志》《市声周报》。李氏后曾任招商局监督处秘书,著有《招商局三大案》(1933)。抗战时期出版《后方巡礼》《西行杂记》两本散文集。后居台湾,晚年收集、整理和出版陈独秀诸多遗文。李孤帆交际广泛,与胡适、徐志摩、郁达夫、吴稚晖、马寅初、经亨颐等社会文化名流皆有往来。

徐志摩此信写作时间可依内容加以推定。信中所提“中社”,系当时上海有名的民间团体,1930年下半年由李孤帆与盛丕华等工商、知识界有志之士筹建。该年12月30日《申报》刊载《中社内容之一斑》,对中社社址(威海卫路150号)、宗旨等作了介绍。31日《申报》刊出《中社开幕通告》。而在次年1月12日《申报》刊载的《中社元旦开幕补记》,表明蔡元培、褚民谊、杨杏佛、吴稚晖等名人曾出席并发表演说,并提到李孤帆是“对中社奔走最力”的一位。

徐志摩是中社网罗的社员之一,并被推为该社图书馆委员会委员。显然李孤帆事先曾邀徐志摩出席中社开幕典礼,但诗人当日恰在南京,无法到场,于是复函解释。徐信中有“社址不知何日落成”的表述,可知当时中社尚在筹备中。1930年11月28日,胡适离沪迁京,拟重回北大任教。此即信中所提“适之已北去”。“但不久即归”或指胡适将于1931年1月初到上海参加中基会第五次常会。由此,徐志摩致李平的这封信并非“作年无考”,而是约写于1930年12月的某个星期四,具体日期待考。

值得一提的是,因徐志摩为中社成员的缘故,其新月社同仁常将中社作为集会场所。如胡适1931年1月12日日记有“‘新月’董事在中社集会,光且等来了,我也列席。这回决定请陆品琴为经理,克木为营业主任,隆基为编辑主任。李孤帆邀在中社吃饭”的记载。徐志摩在同年8月19日致胡适信中写道:“再有一件要事:昨夜在中社为《新月》扩充股份,开会成绩极佳。现决定另招三万,股不足以透支足之,分十五组径招,每组任二千。李孤帆颇热心,自任一份外,另任招二组数目。”此处“李孤帆”应为“李孤帆”,不知是原信笔误,还是整理者误识。是年11月19日徐志摩不幸遭难,在沪故交组织治丧处,办事机关正是设在威海卫路150号中社的社址。